

生境的选择与楚文化的兴起

笪浩波 李想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北 武汉市 430077)

关键词: 生境 楚文化

摘要: 本文借助生态学理论,对楚人的南迁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其迁徙原因进行了剖析。认为自楚先季连族始,开始了南迁。商代前期,其活动地域在丹江流域;商代后期,其活动地域先在丹江与汉水交汇处,后在汉水中游的方山一带;商末至西周时期,其活动地域在湖北西北的荆山一带;东周以后,其中心地域在长江与汉水之间的宜城平原和江汉平原上。迁徙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楚文化的孕育、形成与发展则是楚人对于生境选择的结果。

KEY WORDS: Ecology Chu culture

ABSTRACT: By drawing on ecological theor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rshal the process of Chu people's migration to the South, and analyze the reason for migration. Started from Jilian's tribe, the Chu people moved southward and lived in the Dan River basin during the Early Shang Dynasty. By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y had migrated to the juncture point of the Dan and Hanshui River, and then to the Fangshan area in the middle of the Hanshui River. From the end of the Shang to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Chu people had settled in the Jingshan area in the northwest of Hubei province. From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onward, their hinterland was situated in the Yicheng and Jiangnan plains between the Yangtze and Hanshui River. Both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played th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but the adaption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ight have majorly foster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u culture.

生态学理论告诉我们,动物总是选择最适宜自己生存的环境生活和繁衍。随着环境的变迁,动物也随之发生迁移。作为动物界的一员——人类也不例外。特别是在生产力还较落后的人类早期社会,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自然界中各种环境要素的制约程度远大于人类对抗大自然的能力,因此,生境的选择对于人类的繁衍与发展至关重要。

生境由多种元素构成,其中主要有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动物等。地形、地貌若无构造运动或地质灾变,一般具有长时间的恒定性,而气候则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它的变化对水文、土壤及动植物等都有影响,会造成生境的优越和恶劣。人类对于生境的选择具有主动性,往往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发展来选择较适宜的生境。采集狩猎民族往往以山地或山前丘陵为生境,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动植物食物资源;农耕民族选择河湖水网密布的平原或岗地为生境,因为那里有适宜耕作的土地;游牧民族则选择辽阔的草原为生境,因为那里有适宜的牧场。当生境优

越时,人类的生存空间具有稳定性,人丁兴旺,社会繁荣发展;而生境恶化时,人类生存空间变动频繁,人口减少,社会衰落。人类往往采取改变生活习惯或迁徙的方式来应对变化的生境。生活习惯的改变对于早期人类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而迁徙则是最迅捷最有效的手段。随人类族群的发展壮大,其对于周围环境中的生存资源的需求超过了环境能满足的最大限度时,一个新的更好更大的生境就成了族群能生衍下去的最佳选择。因此,迁移就成了适应自然的一种主要选择形式。初期社会频繁发生的大规模族群迁移就是这种自然界生存规律的体现。

气候因素是生态环境中的首要条件,气候因素的变化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自上世纪70年代末,竺可桢利用考古、物候、文献和观测记载等资料对我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化进行研究后^[1],我国科学工作者从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等多学科对全新世我国的气候变化规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与竺先生基本相符的结论,即全新世以来,气候大致呈冷

暖期交替的形式变化,每个时期气候又有小幅的波动^[2],这种变化与全世界大的气候环境具有一致性^[3]。更有学者将我国的历史文化事件与气候的变化规律进行比照研究,认为文化的兴衰与气候的变化具有同步性,暖期文化兴盛繁荣,冷期文化消退衰落,而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出现在冷期与暖期的交替时期^[4]。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我国全新世的第一个大暖期出现在距今8500~3000年之间^[5],第一个冷期出现在距今3000~2800年之间^[6]。前者属我国的新石器至夏商时期,有人称“仰韶大暖期”^[7];后者属于商末及西周早、中期。因前者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故在此不论。

商代后期处在“仰韶大暖期”的末期冷暖交替阶段,气候的特点由暖湿转向干凉,气候的波动性大,气温变化快,降水不稳定,旱灾频仍。文献所记“涸水一日而三竭”(《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竹书纪年》)、“河竭而商亡”(《国语·周语上》)、“雨土于亳”(《竹书纪年》)及殷墟甲骨卜辞中关于下雨的记载从武丁至帝辛逐期减少,沙尘暴天气增多等都反映了这种情况^[8]。而实际的证据也在不断增加,如有学者根据殷墟水井中的水位在不同时期的高低变化^[9]、安阳姬家屯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层的磁粒由多向少的转变、不同期地层中孢粉类型和数量的变化^[10]以及甘肃寺洼文化所反映的由农向牧的转化^[11]等找到了商代后期气候转干凉的有力证据。商代后期,民族迁徙也较频繁。有学者认为,戎狄南扰迫使周太王古公亶父由豳迁岐,文王迁程后迁丰都是因为陇西北气候转冷、干旱所致^[12]。而到了西周早、中期,即距今3000~2800年之间,则已进入冷期,其特点是北方温凉、干旱^[13],南方寒冷、多雨^[14]。楚人向南的迁徙也恰在商代后期,楚人的大规模迁移是否与气候的冷暖交替变化事件有关?楚人的迁徙与楚文化的勃兴又有何关系?本文想就此谈点看法。不妥之处,还望专家斧正。

一、西周以前楚先人的生存环境

楚人的祖先中最重要的是季连,《史记·楚世家》载“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半姓,

楚其后也。”《索隐》:“《世本》云‘六曰季连,是为半姓。季连者,楚是。’宋忠曰‘季连,名也,半姓所出,楚之先。’”又《大戴礼记·帝系》:“……季连者,楚氏也。”另《国语·郑语》中周史伯谈到祝融八姓时,其中一姓为半姓,即指季连族。无疑,楚人的血亲祖先为季连。如同颧项既是人名,又是族名一样,季连也既是人名,又是族名。季连作为季连族的创始人生存于何时,无从稽考,但季连族在某个时间段的活动则从近年的出土简牘中有迹可寻。

清华大学藏简《楚居》记载了楚公族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而追记也是从楚先祖季连始^[15]。这也反证了季连确为楚人先祖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先君。《楚居》:“季连初降于騫山,氏(抵)于穴窳(穷)。前出于乔(骄)山(宅)尻(处)爰波(陂)。逆上洎(均)水,见盘庚之子,尻(处)于方山,女曰比(妣)佳,秉兹(率)相,晷胄(为上由下)四方。季连闻元(其)有聘,从,及之盘(泮),爰生緄(郢)白(伯)、远中(仲)。毓(毓)蓂(徇)羊(祥),先尻(处)于京宗。……”騫山为老僮所居之地,《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騫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郭璞注:“耆童,老童,颧项之子。”楚人言季连初生于騫山,说明季连的身世与老僮有关,这与文献中记载季连为老僮之后一致。《山海经》记载有多处騫山,而他们的地望皆在汉水以北的中原范围中。本文在此并不考证这些騫山的具体位置,但可以肯定的是楚人的先祖出自中原,这与传世文献所记及楚简中楚人自己所记相一致。

乔(骄)山在《山海经》中也有记载,《山海经·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睢(沮)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东北百里曰荆山。……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睢。……又东北百五十里曰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腹,其木多松、柏,多桃枝钩端。神鬻围处之,其状如人面,羊角虎爪,恒游于睢漳之渊,出入有光。”从《山海经》的记载看,骄山距离荆山及沮、漳二水较近。《山海经》所记的此荆山为《禹贡》所记的南条荆山,即今湖北省西北部的大荆山。按《山海经》所指方位及距荆山的距离看,此乔(骄)山很有可能在丹淅地区。季连族曾居住于乔(骄)山,则说明其族曾迁于湖北省西北部大荆山附近的丹淅地区。

其后,季连族居住在爰波(陂),爰波(陂)应指水边的某个地方。洲(均)水即丹水。联系简文看,季连见盘庚子时是逆丹水而上的,则爰波应在丹水的下游某个地方。简文中未言季连行经汉水,也许爰波就在丹水与汉水的交汇之处。若此,季连族此时应活动在丹水与汉水交汇处的北岸。从季连族与盘庚之子有交往的时间看,季连族迁至丹水与汉水交汇处的时间不迟于商代后期。

将几处地点联系起来看,季连族的迁徙路线很有可能是沿丹江逐渐南迁的,迁徙原因很可能与气候突变有关。不排除商代前期,季连族就已迁居到了丹江流域。

丹江发源于秦岭南坡,俗称丹河,又称均水,亦称丹渊,是汉江最大的支流。它的北源和西源在黑龙江交汇后,经商县、丹凤、商南至荆紫关,流入河南,于鄂西丹江口注入汉江。全长约449公里,流域总面积约16812平方公里。荆紫关以上河段处于秦岭山区,属上游谷段,流入河南和湖北境内的部分则为下游。沿途支流众多,主要支流有武关河、淇河、淅河、滔河等。

丹江流域在地貌上最显著的特色为沿江峡谷与断陷盆地相间,从秦岭至丹江口依次为秦岭峡谷、商丹盆地、流岭峡谷、竹林关普峪河宽谷、湘河街峡谷、淅川荆紫关盆地、关防滩峡谷、李官桥盆地,最后为江口峡谷。其中商丹盆地是该区域一处面积较大而地势最低的山间盆地,海拔高度约600~800米。

丹江流域位于秦岭分水岭的南坡,属亚热带季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日照充足,降雨充沛,气温适宜。现今年平均气温 $7.8^{\circ}\text{C}\sim 14.1^{\circ}\text{C}$,一月平均气温为 0.1°C ,七月份则为 25.1°C ,年均降水量为754毫米,年日照为2145小时,全年无霜期为210天。温和湿润,山林茂盛,动植物资源丰富,非常适宜人类生息和繁衍。

历史上,丹江流域一直就有人类居住。特别是距今8500~3000年,也就是气象史上的“大暖期”,当时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 $1\sim 2^{\circ}\text{C}$ ^[16],该区域更是出现文化上的繁荣。截至目前,该区域发现了30余处此时期的遗址,较重要的在商丹盆地有商县紫荆遗址^[17],丹凤巩家湾遗址^[18],商州东龙山^[19]、陈塬遗址^[20],商南过凤楼遗址^[21]

等,丹淅之会的江口区域有淅川下王岗^[22]、黄桷树^[23]、下集^[24]、下寨^[25]、龙山岗^[26]、双河^[27]等遗址,郧县有辽瓦店子^[28]、青龙泉^[29]、大寺^[30]、中台子^[31]、观音坪^[32]、白鹤观^[33]等遗址,均县有乱石滩^[34]、朱家台^[35]等遗址。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河间盆地和宽谷地带的二级阶地上,遗址大的有30万平方米,如东龙山遗址;小的也有2000平方米。这些遗址文化遗存非常丰富,有些遗址不仅文化层堆积厚,而且时代具有连续性,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直到夏商周时期,中间缺环较少。如紫荆遗址包含有老官台、仰韶、龙山及西周中期几个时期的遗存,东龙山遗址包含有仰韶、龙山、二里头、商早期、西周中期5个时期的遗存,下王岗遗址包含有仰韶、屈家岭、龙山、二里头、西周几个时期的遗存,辽瓦店遗址有仰韶、屈家岭、龙山、二里头、商代早期、西周中晚期、东周几个时期的遗存。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房址、窑址、窖穴、墓葬等遗迹和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陶制生活用品及粟等农作物遗迹。这些发现说明该区域在这一时期存在定居农业,适宜的气候条件使该区域在这一时期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该区域多数遗址的共同特点是往往包含多个时期的遗存堆积,说明遗址是连续使用的。而遗址的连续使用也表明该区域内可供定居的地方有限,各个时代的人们基本选择同一地点居住。但是从商代后期开始,遗址数量呈减少趋势,遗址的文化堆积变薄,普遍出现了文化断层。这一变化与之前迥然有别,显然与商代后期气候冷暖转换期的气候突变有关。这一时期,气温冷暖变化无常,降水不稳定,植物的生长期发生变化或不结果实,加上时有洪水发生,不利种植,动物也减少。因此居住环境转为恶劣,人们由定居生活转为流动生活或迁移他处。这一变化也可以从该区域遗址地层中的动物遗存的种类和数量的变化得以揭示。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文化层中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时代从仰韶文化时期直到西周。具体而言,以第七文化层到第九文化层即仰韶文化期(6900 aBP~5600 aBP)发现的种类最丰富,有鲤属、鳖属、龟科、孔雀属、猕猴、狗、貉、犬科、黑熊、大熊猫、狗獾、猪獾、水獭、豹猫、野猪、家猪、虎、苏门犀、亚洲象、麝、鹿、斑鹿、水牛、毫猪等24种动物,其

中喜暖的动物有7种,占29.17%,其余为长江南北均可见到的适应性较强的动物,占70.83%。这是喜暖动物所占比例最多的时代,说明仰韶文化期是下王岗遗址最温暖时代的代表。动物种类以第五至六文化层即屈家岭文化中期和晚期(5300 aBP~4600 aBP)为最少,一共只有狗、家猪、猪獾、斑鹿、豹子5种,未见喜暖动物,而且出现了喜冷的豹子,可能气候有变冷的趋势。第四文化层即龙山文化期(4200 aBP~4000 aBP)的动物种类又增到龟科、狗、黑熊、虎、家猪、斑鹿、水鹿、轴鹿、豹子9种,其中喜暖动物有水鹿和轴鹿两种,而且是现今分布在大南方的动物,占22.22%,有一种较为喜冷的动物豹,占11.11%,其余为适应性较强的动物,占66.66%,似乎气候比屈家岭文化中期和晚期或稍回暖。第二至三文化层即二里头文化时期(4000 aBP~3700 aBP)的动物种类比龙山文化期又增多,共有鲤属、鲶属、龟科、狗獾、猪獾、家猪、野猪、麂、斑鹿、水鹿、轴鹿、苏门羚12种,其中喜暖的动物有3种,占25%,分布面较广适应性较强的动物占75%,气候似乎和龙山文化期相接近。第一文化层即商末周初(3000 aBP)的动物种类又减少,而家畜增多(增加了黄牛),有狗、狗獾、猪獾、野猪、家猪、豹、斑鹿等8种,未见喜暖的动物,均为适应性较强、分布面较广的种类,说明周代气温开始转冷^[36]。

从《楚居》的记载看,季连族也正是在商代后期迁到了爱波(陂),即丹江与汉水交汇处,随后迁到了方山,也就是说季连族在商代后期已离开了丹淅地区,这与丹江流域出现商代后期遗存缺环的现象相吻合。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进行反推:丹江流域商代前期的遗存很有可能为季连族在该区域活动的子遗。换句话说,先楚文化之源应在丹江流域。

据《楚居》载,方山是季连族随后所迁处,也是季连艳遇比(妣)佳的地方。方山在文献中有记载,《水经·沔水注》:“沔水东迳方山北,……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云:“(襄阳)县西九里有方山,父老传云交甫所见游女处,此山之下曲隈是也。”《名胜志》:“方山,在襄阳府城

西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襄州襄阳县“方山”条“方山,一名汉皋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今湖北襄樊市襄城区以西有方山,紧邻汉水南岸,应即《南都赋》中的汉皋山。文献中所记的汉游女及郑交甫见汉游女的最早版本应出自季连在方山艳遇比(妣)佳的故事。

季连艳遇比(妣)佳的方山应为汉水以南,今湖北襄樊市襄城区以西的方山。方山在襄城区西5公里处,海拔不过150米,临汉江而立,山水相依,地貌奇特,以喀斯特岩溶地貌为主的自然风光,集山、水、林、洞为一体,独具特色。全境地势东低西高,中部隆起。东部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深谷密布;西部丘陵,地势开阔平缓。方山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1200~1400毫米,年平均气温15℃左右,无霜期为270天左右。气候立体特征明显,气候宜人,适宜多种生物群体的繁衍。方山物产富饶,资源丰富。不仅如此,方山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汉水向南流经此地,在其北折向东流,形成一个水曲,方山则居高临下,控扼汉江水道之咽喉,同时它又是古代南襄隘道与随枣走廊之间的一个连结点。方山优越的生态条件非常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而其控南北陆路、扼东西水路交通的地理位置又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商代后期,季连族迁此后,一方面可以在方山中狩猎采集,另一方面可以在汉水中捕鱼捞虾,同时还可以在水曲岸边肥沃的冲击土层上开荒种地。方山及汉水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食物资源,因此,季连族迅速地繁衍起来。《楚居》曰“季连……爱生緄(郢)白(伯)、远中(仲)。媼(毓)鬻(徇)羊(祥)……”^[38],即季连族在此滋生出生緄白(伯)、远中(仲)等支系,其后繁衍兴旺。季连族的发展壮大对商人,特别是其南方铜路的畅通构成了威胁,故商人对季连族进行了征伐。《诗经·商颂·殷武》载“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即是对伐季连族这一事件的记述。《诗经·商颂》应该是最先在西周时期的宋国人中流传的商代诗集,而《殷武》则是其中一首歌颂武丁武功的诗篇。由于季连族与楚人有关,故宋国人在传诵这首诗时就与西周时期的楚人联系起来了,故言武丁所伐为荆楚。武丁伐季连族的事件还见于殷墟卜辞,共有两条“乙未[卜],贞:立事[于]南,

右比[我],中比與,左比𩇑;“乙未卜,[贞]:宰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與,左比𩇑,十二月。”^[39]这两条武丁时代的甲骨卜辞中提到的“我”、“與”、“𩇑”都是当时的方国,且位置在商王朝的南方,三个国家在武丁展开的对南方荆楚即季连族的军事行动中充当右、中、左三军。“我”国不可考。“與”即举,位于江汉地区的举水流域。“𩇑”在湖北随州市东,近年在随州市淅河镇叶家山一带发现了商末周初的𩇑国国君墓地,表明商代的𩇑国应距此地不远^[40]。铭文中“𩇑侯𩇑”的记载^[41] 𩇑的写法同于甲骨卜辞的写法,应该就是卜辞中的方国𩇑。从当时的布阵看,此三国在南边,商军在北边对季连族形成夹攻之势。从《诗经·商颂·殷武》的记载看,季连族受到沉重打击,最后诚服。受商人的驱赶,季连族被迫他迁。

二、西周时期楚人的生存环境

《楚居》载季连族随后又从方山西迁到了京宗“季连……先处于京宗。”京通荆,京宗即指荆山之首。关于《楚居》中的京宗(荆山),本文作者另有论述^[42],在此不复论。季连族迁至荆山的时间大致到了商代晚期。

荆山位于武当山东南,汉江西岸,系秦岭—大巴山系向东南的延伸部分,也是二三级阶地的交汇地带。地势西北巍峨陡峻,东南谷地宽广,呈北西—南东走向。北始房县青峰镇大断层,南止荆门—当阳一线,长约150公里;西至远安沮水地堑,东到荆门—南漳一线,宽约20~30公里。面积约3100平方公里。因古代满山生长荆条(灌木)故名。地质构造属扬子准地台,由石灰岩组成,属燕山隆起褶皱带,是强烈上升的新构造运动区。地貌上,西北部山高谷深,巍峨陡峭,沟壑纵横;东南部山低谷浅,坡度略缓,稍加开阔,但均为喀斯特式中、低山地。山岭多呈狭长形,山顶大致等高。喀斯特漏斗(溶斗)、溶蚀洼地均发育于山顶面上,属山原期喀斯特形态。其高度由西北向东南略减,海拔一般为1200~1800米,主峰聚龙山1852米,最高点望佛山1946米。长江支流沮、漳河源于山南,沮河发源于湖北保康县王家大岩,流长226公里;漳河发

源于保康黑林,流长199公里。两河相会后始称沮漳河。沮漳河长88公里,于今沙市入长江,以沮河为源,全长314公里,流域面积7216平方公里。汉江支流蛮河源于山北。荆山东北、东南则过渡到海拔200~50米的宜城平原和江汉平原。该区年均气温15℃左右,无霜期230~240天,年降水量1100多毫米。气候温湿,山高林密,动植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约50%,以松、杉、栎树种为主,并有獐、鹿、野猪等动物。河谷平原可开垦为耕地,非常适宜人类生息和繁衍。

从地理环境看,当时的荆山远离交通要道,偏处蛮荒之地,自成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与世隔绝。其间山水相间,动植物资源丰富,既是一个能偏安一隅的幽僻之处,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休养生息之地。季连族迁到荆山后,隐匿于世,有了喘息和重整旗鼓的机会。故《史记·楚世家》曰“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记其世。”季连族在此经过休养生息,重新发展起来,并繁衍出多个支系,如濮、庸、楚等。《楚居》曰:“穴畚(鬻熊)迟徙于京宗,……生亓叔、丽季。丽不从行,渭(溃)自胁出,妣病宾于天,巫咸(巫咸)赅(该)元(其)胁以楚,氏(抵)今日楚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至鬻熊在荆山时,分出了两个支系,即亓叔和丽季(熊丽),而至鬻熊始正式命其族为楚。鬻熊生存的时代为殷末周初,也就是说,楚产生于周初,此时的楚应具有邦国性质。

西周早期,楚人仍生活在荆山一带。《楚居》:“穴畚(鬻熊)迟徙于京宗,……至畚狂亦居京宗。至畚绎与屈紃,……至畚只、畚舫、畚樊及畚锡、畚渠,尽居夷屯。畚渠徙居发渐……”《墨子·非攻下》载“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即熊丽开始在沮水与荆山之间讨伐纣己,扩张领地。又《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右尹子革追忆先祖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楚人更是明言其先王熊绎曾在荆山创业。《史记·楚世家》也有同样的记载。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记载的一致也证明了西周早期,季连族的一支——楚人确实生息在荆山一带。

至鬻熊始,楚人才开始重新与外界有了联系。《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同篇记楚武王之

言“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史记·周本纪》:“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太颠、闭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往归之。”鬻子即鬻熊。鬻熊出山与周交往,也表明了季连族的一支——楚的重新崛起。《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华氏,居丹阳。”至熊绎时,楚有了一定的势力,故得到了周成王的加封,成了周的一个异姓封国,楚国自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熊绎从京宗徙居夷屯则是楚国脱离山地生活再次走向平原的重大举措。夷屯位于南漳武安镇境^[43],此地界于山地与平原的交界处,多为低山丘陵区。对于实力还不够强大的楚国而言,此地进可攻伐江汉间的诸邦国,退又可依荆山根据地作为防守,攻守兼备,是开疆拓土的最佳据点。至熊渠时,楚人开始了对江汉地域的挹伐。为此,熊渠迁到了发渐。发渐的具体位置目前无考,但联系楚人从夷屯到都的走向看,发渐很有可能在今湖北省宜城的西山之中^[44]。《史记·楚世家》载“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郢。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竹书纪年》有类似记载。庸的位置较明确,为湖北竹山县一带,裴骃《集解》引杜预注“庸,今上庸县。”《正义》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昔周武王伐纣,庸蛮在焉。”杨粤据学者考证,为杨水流域的粤人^[45],属百越人的一支,粤通越。《水经·沔水注》:“杨水又北迳竟陵县北,又北,纳巾吐柘。柘水,即下杨水也……巾水又西迳竟陵县北,西迳杨水,谓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郢国也。”说明杨粤地近郢国,在江汉之间。鄂为东鄂,在长江边^[46]。熊渠虽然一度强大得足以驰骋于江汉之间,但因其偏处于荆山一隅,无论是从经济资源还是战略位置上都不利于对江汉地区的控制,即使能凭一时之武力占领江汉之间,但终因鞭长莫及,无法长久掌控,所以很快放弃了胜利成果。熊渠很快去王号的原因固然是周厉王的暴虐,但更主要的还是迫于征服地的反叛

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熊渠的失败使楚的统治者明白了要想在江汉之间有所为,必须走向平原——江汉腹地。其后的几位楚君一直在为此努力,《楚居》:“……畬摯居发渐。畬摯徙居旁岍。至畬延自旁岍徙居乔多。至畬甬(勇)及畬严、畬相(霜)及畬雪及畬训(徇)、畬号及若器(敖)畬义(仪),皆居乔多。若器(敖)畬义(仪)徙居箬(都)。”直至若敖迁居都才完成了楚国由山地国家向平原国家的转变。

三、东周时期楚人的生存环境

若敖迁居都时在西周晚期东周初期,《史记·楚世家》:“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若敖迁居之都位于宜城平原上^[47]。

宜城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北部,汉水将宜城平原分割为东西两大部分,以汉水为界,分别往东部西部呈平原、丘陵、山地变势,阶梯式延伸。东西两面环山高起,中部河谷平原,北高南低,向南敞开。东部属大洪山余脉,北端山脉呈东西走向,南端多南北走向,微向西南倾斜,与襄阳、枣阳、随州交界处到汉江冲积平原为低山丘陵区。西部属荆山余脉,多呈南北走向,为丘陵区。海拔在50~150米之间,东部平原海拔在50米以下。水系以汉水为主干,构成“扇形状”。汉江在此宜城平原的河段长59公里,汇纳蛮河、莺河等大小支流十余条。汉水以东主要有莺河、落花河、牌坊河、响水沟、南洲河、麻雀河、连江河、黑石沟等支流,汉水以西主要有蛮河、木渠沟、碑河等。流域面积2113平方公里。蛮河又称小河,境内河段长63公里,汇纳大小河流24条,流域面积663.6平方公里。莺河又称南泉河,境内河段长59.4公里,汇纳大小河流23条,流域面积403.9平方公里。

宜城平原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春秋季短,冬夏季长。冬半年盛行偏北风,夏半年盛行偏南风。冬冷夏热,陆性率64%,有典型的大陆气候特征。境内各地年降水量在800至1000毫米之间,年平均降水天数为116.4天。日照时数多年平均为1900小时,年平均气温15至16℃,境内各地年平均气温相差不过0.5℃。

气温一般 1 月为最冷,平均 2.6℃;7 月最热,平均 28℃。宜城平原生物种类较多,资源丰富。其中野生植物主要有化香、水竹、斑竹、桂竹、山楂、檀木、棠梨、盐肤木、六月雪、葛藤、紫藤、野葡萄、金银花、杜鹃、牡丹、桔梗、百合、灵芝、麦冬、兰花等;野生动物主要有豺、红腹锦鸡、苍鹰、黄喉貂、斑羚、狼、黄腹鼬、狗獾、猪獾、花面狸、小鹿、华南兔、赤腹松鼠、普通鸬鹚、大白鹭、华东环颈雉、董鸡、珠颈斑鸠、棕腹啄木鸟、八哥、灰喜鹊、喜鹊、大嘴乌鸦、戴胜、大山雀、王锦蛇、乌梢蛇、中华大蟾蜍、黑斑蛙、湖北金线蛙等。

宜城平原为粮仓,历史上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佳地。汉、蛮两河的冲击使这里地势比较平坦,大量的沉积物堆积积累了肥沃的土壤,极宜种植粮食等农作物,加之西山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之成为人类理想的居住和生活之地。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生活和繁衍,如宜城曹家楼^[48]、老鹄仓遗址等^[49]就是早期人类在此居住生活的遗留。

楚人得到了这方宝地。此地背依荆山,北、东有汉水环伺,汉水以北又有伏牛山、桐柏山等峙守,东北有大别山和鄂东丘陵阻隔,南有广袤的江汉平原可以作为缓冲地带,其南又有天堑长江横拦,四周围成一个天然的防护屏障。其内,楚人有一个广大的回旋空间,进可攻,退可守。春秋时期,气候又开始回暖^[50],风调雨顺,楚国的经济开始发达起来,楚国的国力也强大起来,开始了扩张之路。文献载楚国春秋初期的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国语·郑语》),楚武王灭罗、卢戎,伐舟、绞,“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楚世家》),从而巩固了根据地,为将来的扩张奠定了基础。楚文王灭申、息,打通了北进之路。楚成王扫弦、黄,灭夔,打通了东进西拓的通道。而受周王“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之命,楚人从此北进南拓,东征西伐,如秋风扫落叶,很快就占据了南半个中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铸就了灿烂的楚文化,而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于生境的正确选择。正如楚人屈完在公元前 656 年,面对率六国联军来讨伐楚国的齐桓公还能底气十足地放言“若必以攻战为上,楚国方城为城,汉水为池,甲兵虽众,无所用也。”可见楚人是多么有恃无恐,其对于自己的地理优势的自信程度由此

可见一斑。

考古研究表明,自成特色楚文化的形成始于春秋时期,而其又是脱胎于中原周文化的母体,吸取南方蛮夷文化之精髓^[51]。可以这样说,楚文化的孕育、形成及发展,正是楚人对于其生境选择的结果。

- [1]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 1972(1).
- [2] 黄春长. 环境变迁[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3] 叶笃正主编. 中国的全球变化预研究(二)[M]. 北京: 气象出版社, 1992.
- [4] 方修琦, 葛全胜, 郑景云. 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 古地理学报(6 卷), 2004(1).
- [5] 施雅风主编. 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C]//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2.
- [6] 同[1].
- [7] 段万倬. 我国第四季气候的初步研究[C]//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8.
- [8] 胡厚宣. 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C]//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下).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9] 周伟. 商代后期殷墟气候探索[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9(1).
- [10] 唐际根, 周昆叔. 姬家屯遗址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与商代安阳地区的气候变化[J]. 殷都学刊, 2005(3).
- [11] 黄春长. 渭河流域 3100 多年以前资源退化与人地关系演变[J]. 地理科学, 2000(1).
- [12] a. 王晖, 黄春长. 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J]. 史学月刊, 2002(1). b. 黄春长, 庞奖励, 陈宝群, 周群英, 毛龙江, 李平华. 渭河流域先周一西周时代环境和水土资源退化及其社会影响[J]. 第四季研究(23 卷), 2003(4).
- [13] a. 同[1]. b. 侯甬坚, 祝一志. 历史记录提取的近 5 ~ 2.7ka 黄河中下游平原重要气候事件及其环境意义[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 卷), 2000(4). C. 余同元. 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时空差异性及其影响[J].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1996(3).
- [14] 蒙文通. 古族甄微[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3.
- [15]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 2010.
- [16] 同[1].
- [17] 西安半坡博物馆. 1982 年商县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简报[J]. 文博, 1987(3).
- [1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商洛地区文管会. 陕西丹凤县的巩家湾遗址[J]. 考古与文物, 2001(6).
- [1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商州市东龙山汉墓[J]. 文博, 2001(4).

- [2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考古勘探队. 商洛陈堰遗址[J]. 文博, 2003(2).
- [2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资料。
- [2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浙川下王岗[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23]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 浙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J]. 华夏考古, 1990(3).
- [24]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川下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 中原文物, 1989(1).
- [2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 [26]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 浙川龙山岗遗址发掘报告[J]. 华夏考古, 1990(3).
- [27] 北京大学考古系,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省浙川双河镇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增刊) 2002.
- [28] 武汉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 郧县辽瓦店子[C]//湖北省南水北调工程重要考古发现(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青龙泉与大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 [30] 同[29].
- [3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郧县中台子遗址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 2011(1).
- [3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堰市博物馆. 丹江口市观音坪遗址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 2010(2).
- [3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郧县白鹤观遗址东周墓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 2010(3).
-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 湖北均县乱石滩遗址[J]. 考古, 1986(7).
-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 湖北均县朱家台遗址[J]. 考古学报, 1989(1).
- [36] 贾兰坡,张振标. 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中的动物群[J]. 文物, 1977(6).
- [38] 整理者对毓有两种解释,或认为 毓(毓)可能读为“游”,在正文中取此说括注“游”;或读本字意为生育,“毓徜徉”意为生育顺畅。我们认为第二种说法更优,取后说括注。
- [39]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 甲骨文合集(第3册),第5504,5512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40] 笪浩波. 从近年出土文献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J]. 江汉考古, 2011(2).
- [4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州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工作获阶段性成果—西周早期曾国史研究将有重大突破[J]. 江汉考古, 2011(3).
- [42] 同[40].
- [43] 同[40].
- [44] 同[40].
- [45] 何浩. 楚灭国研究[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89.
- [46] 同[40].
- [47] 同[40].
- [48]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馆,宜城县博物馆. 湖北宜城曹家楼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学报, 1988(1).
- [4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城市博物馆. 湖北宜城老鹄仓遗址试掘报告[J]. 江汉考古, 2003(1).
- [50] 同[1].
- [51] 王光镐. 楚文化源流新证[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 李自智)